

历史上中朝两国地图学交流

汪 前 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010)

内 容 提 要

中国的地图知识在公元1世纪以前已传入朝鲜。从朝鲜人在唐代便能绘制地图的事实来看, 中国地图在唐代以前就传入了朝鲜。中国传统的地图学理论和测量方法最迟在唐代也已传入朝鲜。朝鲜的古代地图学一直是在中国传统地图学思想指导下发展。

关键词: 中国, 朝鲜, 地图学, 交流

一、中国传统地图理论的输出及朝鲜绘图的开始

(一) 中国早期地图知识在朝鲜的传播

据研究: 早在公元1世纪初, 就有一些朝鲜人能背《诗经》、《尚书》和《春秋》等^{〔1〕}, 说明在此之前经书已经传入朝鲜。这些经书中有不少关于地图的知识。

《诗经·周颂》曰: “于皇时周, 陟其高山。墮山乔岳, 允犹翕河。”^{〔2〕}郑玄认为“犹”就是地图^{〔3〕}, 后二句的意思是指按照地图上所指示的山川, 依次进行祭祀。

《尚书·洛诰》曰: “召公既相宅, 周公往营成周, 使来告卜, 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 ‘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 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 亦惟洛食。俘来以图及献卜’。”^{〔4〕}这是讲述为了选择洛阳城址而特别绘制地图的情形。

《春秋左传·宣公上》曰: “昔夏之方有德也, 远方图物, 贡金九牧, 铸鼎象物, 百物而为之备, 使民知神奸, 故民入川泽山林, 不逢不若, 魑魅魍魉, 莫能逢之, 用能协于上下, 以承天体。”^{〔5〕}这里论述的是原始地图的形状。

经书的广泛传播是在朝鲜三国时期。小兽林王二年(372年)高句丽建立了儒学教育机关“太学”和“局堂”。“太学”是最高学府, 传授五经和三史, 只招收特权贵族子弟, 以培养国家官吏。“局堂”招收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 教他们学习五经三史和射箭等^{〔6〕}。百济从建国初期便传授经书, 到四世纪已有完备的教育机关, 近肖古王二十九年(394年), 有名儒获得经学博士称号。^{〔7〕}

据《三国史记》卷第三十八“杂志”第七“职官”上: “新罗国学属礼部, 神文王二年(682年)置, 景德王(742—765年)改为大学监, 惠恭王(765—780年)复故。……教授之法, 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

收到修改稿日期: 1994年1月20日

业。……若能兼通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或差算学博士若助教一人，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8〕}

文中的《九章》指的是《九章算术》。该书勾股章为测量地物的方法。而在魏晋刘徽注中专列一卷阐述“重差”。刘徽在“序”中解释说：“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勾股则必以重差为率，故曰重差也。”^{〔9〕}又说：“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10〕}该书是隋唐时期中国官学中的教材^{〔11〕}，新罗所立，也是仿中国而为之。

这里的三史，即《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书中有大量关于绘制和使用地图的记载。《史记·三王世家》曰：“‘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12〕}《汉书·李广传》曰：“（李）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13〕}《后汉书·李恂传》曰：“后拜侍御史，特节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14〕}这些有关地图的知识随书一道传入朝鲜。

（二）“制图六体”传入新罗

《海东金石苑》卷二“唐新罗朗慧和尚塔碑”（崔致远撰）曰：“论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则昔武烈大王为乙祭时，为屠豸貊乞师计，将真德女君命，陞覬昭陵皇帝，面陈‘愿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许，庭赐华装，受位特进。一日，召诸番王子宴，大置酒，堆宝货，俾恣满所欲。上乃杯觞则礼以防乱，缵綵则智以获多。众辞出，文皇目送而叹曰：‘国器’。及其行也，以御制并书《温汤》、《晋祠》二碑暨御撰《晋书》一部赉之。时蓬阁写是书裁竟二本，上一锡储君，一为我赐。复命华资官祖道青门外，则宠之优、礼之厚，设聋盲乎智者足亦骇耳目，自兹吾土，一变至于鲁，入世之后大师西学而东化，加一变至于道。则莫之与京，舍我谁谓，伟矣哉！”^{〔15〕}

昭陵皇帝为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为627年至649年。赐给武烈大王的御撰《晋书》（648年）中有《裴秀传》，此传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传统制图的理论“制图六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之于山海隔绝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16〕}按现代地图学的名词来说：“分率”就是比例，“准望”就是方位，“道里”就是距离。

从上述可知《晋书》已由新罗武烈大王带回朝鲜，那么书中的“制图六体”理论也就传入了朝鲜。

（三）朝鲜始绘地图的时间

关于朝鲜始绘地图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唐朝时期便会绘图是没有问题的。朝鲜

古籍《三国史节要》卷第八曰：“高句丽荣留王十一年（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秋九月，高句丽遣使入唐，贺擒突厥颉利可汗，仍上封域图。”^{〔17〕}这“封域图”便是地图。高句丽为什么在遣使恭贺的时候要向唐廷献图呢？这是因为高句丽对于唐廷的惧怕，献图的目的是表示称臣。这种思想来源于中国。《韩非子·五蠹篇》中说：“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18〕}。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献图就是战国时燕国荆轲向秦王献图^{〔19〕}，以后代不乏人。高句丽在外事活动中娴熟地使用这种方法，表明他们并非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这种思想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在这个时候才会绘制地图的。一个“仍”字，表明他们以前还有过这种举动。

二、宋元时期的双向流布

（一）《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地图来源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宋代徐兢（1091—1153年）撰写的一部高丽见闻记，全书共四十卷，于宣和六年（1124年）问世。1126年，金军南下进攻北宋，宋都沦陷，北宋遂亡。经此战乱，原在御府保存的正本亡佚。乡里徐周宾曾借去徐兢家藏的副本，未按时返还，经金灭宋的大动乱，也不知去向。十年之后，在江西洪州发现了副本，但除“海道”部分的两卷较完整外，其余各卷的图皆已散失。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全书共四十卷，分为二十九门，三百余条。二十九门为：1. 建国、2. 世次、3. 城邑、4. 门阙、5. 宫殿、6. 冠服、7. 人物、8. 仪物、9. 仗卫、10. 兵器、11. 旗帜、12. 车马、13. 官府、14. 祠宇、15. 道教、16. 释氏、17. 民庶、18. 妇人、19. 皂隶、20. 杂俗、21. 节仗、22. 受诏、23. 燕礼、24. 馆舍、25. 供张、26. 器皿、27. 舟楫、28. 海道、29. 同文。^{〔20〕}目下有介绍内容的序文，大体上皆有绘图。没有绘图的书中有交待，如第四十卷《同文》序中有“省其绘画”^{〔21〕}之句，第十七卷《祠宇》第六小条中又有“略其图载其名焉”^{〔22〕}等话。

既称“图经”，必有地图，这是当时的体例，不容置疑。但原书中的地图究竟是徐兢绘的，还是采用高丽所绘的地图，亦或依据高丽地图改绘而成的呢？

徐兢访问高丽是在宣和五年（1123年），三月十四日从首都汴京（今开封）出发，五月四日到达明州（今宁波），五月十六日由明州出发，六月六日到达高丽群岛，六月十二日抵高丽首都松都（既开城），入住顺天馆。在高丽滞留一个月，七月十三日离开松都，经四十二天航行回到明州，往复三阅月。^{〔23〕}可见徐兢在高丽期间是没有时间去亲自测绘地图的，书中的地图应是根据从高丽得到的地图改绘的，因为高丽原绘地图未必能符合书本的要求（如大小、详略等）。可惜此图已佚，无由作进一步的探索。

（二）南宋时高丽入贡索图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五“前言往行有所感发条”曰：“国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舫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顾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送与之。于是多逊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人口多寡以归。……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贡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

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秀公之举，盖因前事有所感发也。”^{〔24〕}

关于卢多逊修天下图经，史籍中亦有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中曰：“开宝四年（971年）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图经”^{〔25〕}，这说明《梁溪漫志》所载当为属实。“国主亟令缮写”一句表明高丽也编有各州图经，不然如何能“亟令缮写”，从而也说明中国的图经（包括其中的地图）又经卢多逊之手传入宋廷。

《梁溪漫志》中所述熙宁中高丽入贡途中“悉要地图”之事在《梦溪笔谈》卷一三“权智”条中有相同的记载^{〔26〕}。另外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请防禁高丽三节人事”文说：“臣窃闻高丽国进奉使人下三节人，颇有契丹潜杂其间，经过州县，任便出入街市买卖，公人百姓只应交通，殊无检察，所至辄问城邑、山川、程途、地里、官员、户口，至乃图画，标题意要，将还本国。自明州至京水路三千余里，昨淮浙饥疫，公私调耗，国之虚实，岂宜使蕃夷细知？”^{〔27〕}

似乎是说契丹借高丽人进贡之便来窃取地图，故此引起宋人更大的警惕。《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国信所”载：“〔皇祐〕五年（1053年）二月二十一日，诏令国信所，申明旧条，密谕河北州军，今后人使驿舍，不得供设州府图障。先是户部副使傅永言：‘臣昨奉使契丹，接伴副使李翰问益州事，臣诘其由，乃是尝于都京驿见益州图’。”^{〔28〕}其实高丽人和契丹人“悉要地图”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

（三）金士衡等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日本京都西本愿寺藏有明建文四年（1402年）朝鲜人所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此图宽171厘米，长164厘米，朝鲜李桀藏有摹绘本^{〔29〕}。图上权近“题跋”曰：“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率皆译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右政丞丹阳李公，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详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疆域，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以不出户庭而知天下也。夫观图籍而知地域之遐迩，为治之一助也。二公之所以拳拳于此图者，其规模局量之大可知也。近以不才，承乏参赞，以从二公之后，乐观此图之成而深幸之。既偿吾平日讲求方册而会观之志，又喜吾他日退处环堵之中，而得遂其卧游之志也。故书此于图之下云。是年秋八月阳村权近志。”^{〔30〕}

“金公”即金士衡，“李公”即李茂^{〔31〕}。由此“题跋”可知金士衡和李茂根据中国吴郡（江苏苏州）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人清濬（1328—1392年）《混一疆理图》二图再增补上朝鲜和日本部分于建文四年（1402年）绘成此图，真正是中朝合璧。

中国史籍中也有关于《混一疆理图》的记载。明叶盛（1410—1474年）《水东日记》卷十七中说：“予近见《广舆疆里》一图，其方周二尺许，东自黑龙江西海祠，南自雷、廉、特磨道站至夕滩、通西，皆界为方格。大约南北九十余格，东西差少。”^{〔32〕}书中还说在此图背后有嘉禾人严节的跋：“此图乃元至正庚子台僧清濬所画。中界方格，限地百里，大率广袤万余。其间省、路、府、州，别以朱墨。仍书名山大川陆界限。予喜其详备，但与今制颇异，暇日因摹一本，悉更正之。黄圈为京，朱圈为藩，朱竖为府，朱点为州，县繁而不尽列。若海岛沙漠，道里辽绝，莫可稽考者，略叙其概焉。时景泰壬申正月，嘉禾严节贯中谨识。”^{〔33〕}

由此可知《混一疆理图》又称《广舆疆里》图，确为清濬在元至正庚子（1360年）所绘，

后因金士衡等奉使南京所见而携带回国。

(四) 风水地理与风水地图

朝鲜高丽时期盛行地理风水,这主要是受中国的影响。1022年入宋使臣带回阴阳二宅书,1057年高丽任用专讲遁甲和风水的宋人张琬作太史监候。1106年王侯命儒臣金仁存、崔濬、朴升中等删定中国阴阳地理诸家书籍,编纂《海东秘录》。1195年神宗王王璋更命群臣讨论国内山川形势究竟在何处建郡都为有利,最后特别设立了“山川裨补都监”,专门到各地去勘察。此外,在高丽时代,作为掌官有关图讖、风水事务的官署而设置的“书云馆”,一直持察保留到朝鲜时代^[34]。

宋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124年)卷三“城邑”中对高丽利用堪輿理论进行都城选址定位有比较具体的论述:“高丽,素知书,明道理,拘忌阴阳之说,故其建国必相其形势,可为长久计者,然后宅之,自汉末,徙九都山下,后魏至唐,皆居平壤,至李勣平其地,建都护府,则尝遁寄稍东,不详其所。唐末复国,当是今所都地,盖尝为开州,今尚置开成府。其城北据崧山,其势其乾亥来,至山之脊,稍分为两岐,更相环抱,阴阳家谓之龙虎臂。以五音论之,王氏商姓也,西位欲高,则兴乾西北之卦也。来岗亥落,其右一山屈折,自西而北转,至正南一峰特起,状如覆盂,因以为按。外复有一按,其山高倍,坐向相应,宾主丙壬。其水发源自崧山之后,北直子位,转至艮方,委蛇入城,由广化门稍折向北,复从丙地流出。已上盖乾为金,金长生,在巳,是为吉卜。自崧山之半,下瞰城中,左溪右山,后岗前岭,林木丛茂,形势若饮涧苍虬,宜其保有东土,历年之久,而常为圣朝臣属之国也。”^[35]

李朝太祖(1392—1398年在位)是风水地理说的信奉者,对带有“龙”字的地名非常关心,自即位时起,也就想迁都鸡龙山。他在即位后第二年(1393年)一月,接受权仲和呈送的《杨广道鸡龙山都邑地图》后,立刻亲赴鸡龙山观察那里的山水形势,命书云观和风水专家进行详细观察。^[36]

以制作图讖而闻名的人,在新罗时代有元晓、义湘、道诜等,在高丽时代有虚轩、指空、懒翁(1320—1376年)等,在朝鲜时代有无学(1327—1405年)、南师古(16世纪60年代的人)、魏汉祚(?—1602年)、李元菡(1517—1578年)等。道诜(827—898年)是最著名的人物,他的《道诜秘记》曾风靡一世。无学曾在朝鲜时代被任名为太祖的国师,其《无学秘诀》流传至今。郑礪著有《郑北窗秘诀》和《郑北窗栋记》,西山大师(1520—1604年)著有《西山大师秘诀》,李得胤(1553—1630年)著有《李西溪家藏诀》。南师古的《南师古秘诀》也流传至今。魏汉祚门人李元菡的《土亭秘诀》也具有较大影响。^[37]

中国堪輿学起源很早,甲骨文中便有记载:“□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五八三)又“乙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乙》五七〇)。^[38]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中论述了这种“贞事”的格式:“卜日——卜——贞人——贞事——兆——在某月——卜地——中左右之屯聚也”^[39]。从这种格式中可以推断当时卜宅的主要内容为:(1)时间:决定动土兴建的年、月、日、辰;(2)空间:选定建造的地点、范围。

古文献中也有关于早期相宅的记载,《诗经·大雅·公刘》曰:“笃公刘,于胥斯原……既顺乃宣……陟则在岫,复降在原。”“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岗,乃观于京。”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幽居允荒。”^[40]综合该诗所述,相宅的基本内容为:(1)全面巡视,考察自然的山、水、林木

等；（2）丈量土地，确定建筑基址范围；（3）测量日影，确定建筑朝向。^{〔41〕}

堪輿学理论形成是以晋郭璞《葬书》诞生为标志。郭璞在《葬书》中说：“《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42〕}这是堪輿学理论的核心。

堪輿学在唐宋以后逐渐发展为两大派别。即形势派（峦体派）和理气派，而前者尤重地形地势，所以这一派的著作中绘有不少堪輿地图。

根据钱士青《钱氏所藏堪輿书提要》^{〔43〕}的分类属于形法（峦头）派的明代著作有：《地理醒心录》（傅振商辑，天启五年版）、《地理心法》（杨芸著，万历四年版）、《执砂经》（廖禹著、江之栋辑，万历四十二年版）、《地理玉髓经》（张子微著，天启七年版）、《地理仙婆集》（张鸣凤编，万历十五年版）、《地理人天共宝》（黄慎编，崇祯六年版）、《辟径集》（李秩著，嘉靖二十年抄本）、《人子须知》（徐善继著，万历十一年版）、《地理四家》（张亘著，永乐十一年版）、《一贯堪輿》（唐世友辑，天启四年版）。其中《人子须知》一书分为八集：（1）三大干龙总览图、论帝都、历代帝都图考、论干龙支龙太祖少祖等，（2）论龙出身开幃剥换过峡旁正老嫩长短真假贵贱等附图（朱夫子祖地图在内），（3）穴法总论、论窝钳乳突各形穴等，（4）论定穴之要、以八卦定穴、穴法三十六、怕怪穴等（5）砂法总论、论前应后照乐山下手砂官星等，（6）水法总论、论水到局、明堂阳基总论等，（7）论九星卦例之谬、太极图说、原八卦原干支等，（8）二十四龙所主吉凶万年图等。^{〔44〕}书中不仅有具体地形图，而且还有全国山脉走向大势图——《三大干龙总览图》。虽然我们还无足够证据证明此书已传入朝鲜，但是此类书已传入朝鲜恐怕不会有问题。我们也可以从这类书中看出形法派著作中堪輿地图的内容及其在朝鲜的影响。

（五）《历代地理指掌图》

朝鲜《三国遗事·纪事》卷第一，“鞞鞞”条引“指掌图”四次：“按指掌图，渤海在长城东北角外。”“指掌图云，挹娄与勿吉皆肃慎也。”“按东坡指掌图，辰韩之北，有南北黑水。”“指掌图，黑水在长城北，沃沮在长城南。”^{〔45〕}这里的《东坡指掌图》应是中国宋人税安礼所绘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梁溪漫志》卷六“地理指掌图”条曰：“今世所传《地理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详，论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託之东坡，其序亦‘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缀缉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最后有本朝改废置镇郡一图，乃有崇宁以后，迄于建炎、绍兴所废置者。此岂出于东坡之手哉！”^{〔46〕}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则认为“地理指掌图一卷，蜀人税安礼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此图初版于北宋末政和、宣和之际，日本东洋文库现存有南宋初年绍兴前期的刻本。^{〔47〕}上引《三国遗事》为高丽释一然（1206—1289年）所撰，书成于宋末元初。表明《历代地理指掌图》早在宋末便已传入高丽。

《历代地理指掌图》有图四十四幅，它们是：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历代华夷山水名图、帝尝九镇之图、虞舜十有二州图、禹迹图、商九有图、周职方图、春秋列国之图、七国壤地图、秦郡县天下图、刘项中分图、两汉郡国图、汉异姓八王图、汉吴楚七国图、东汉郡国之图、三国鼎峙图、西晋郡国图、东晋中兴江左图、刘宋南国图、萧齐南国图、萧梁南国图、南陈南国图、元魏北国图、高齐北国图、后周北国图、隋氏有国图、唐十道图、唐郡名图、唐十五采访使图、李唐藩镇疆界图、朱梁及十国图、后唐及五国图、石晋及七国图，

刘汉及六国图、郭周及七国图、天象分野图、二十八舍辰次分野之图、唐一行山河两戒图、历代杂摺地名图、太祖皇帝肇造之图、太宗皇帝统一之图、圣朝元丰九域图、本朝化外州郡图和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这些地图虽然不如《輿地图》、《地理图》^[48]那样准确，但图中基本上包括了地图的地理要素和数理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形象的绘图法。它的传入无疑对朝鲜的地图绘制会产生积极影响。

三、明代交流的新格局

(一) 方志与方志地图

中国地方志何时传入朝鲜，还不清楚。宋卢多逊访高丽时带回了高丽人自撰的地方志^[49]，表明最晚在宋朝朝鲜人不仅知道中国的地方志，而且还能自己编志。

朝鲜现存最古的地方志《平壤志》由李尹（斗寿，1533—1601年）纂修。原志九卷宣祖二十三年成，续者五卷英祖六年成，后续志二卷哲宗五年成。从内容上看完全是仿照中国的地方志体例纂修的。该志分疆域、分野、沿革、城池、部坊、郡名、风俗，形胜、山川、楼亭、祠墓、公署、仓储、学校、古迹、职役、兵制、驿递、桥梁、土产、土田，贡赋、教坊、院亭、寺宇、户口、人物、孝烈和古事等二十九门。现存的方志还有《庆尚道地理志》。据记载，李朝世宗六、七年，命令各道调查道内各邑的沿革、山川形势、风俗、户口、土产和姓氏等，编撰各道地理志，其它各道地理志均亡佚，仅存此道。现存李朝时期编修的另一部地方志是《江华府志》（二卷），全鲁镇编纂，上卷分建置沿革、形胜、姓氏、风俗、山川、土产、城郭、产土、关梁、镇堡、塾台、烽燧、坊里、岛屿、官殿、府廨、学校、祠坛、亭台、陵墓和佛宇21门，下卷分职制、军制、贡土、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古迹和事实九门。

这些方志的体例基本与中国地方志相同，表明它们是依照中国地方志编纂的。中国的地方志大多是有地图的，如宋代《嘉定赤城志》（1223年修）便有地图13幅（今存9幅），《宝庆四明志》（1227年修）有地图16幅，《景定建康志》（1261年修）有地图19幅，《咸淳临安志》有地图13幅。^[50]方志中的地图可以分为治图、境图、山川图、府廨图、罗城图等，其中有的图绘制水平是很高的。中国地方志传入朝鲜必将会将中国的方志地图带入朝鲜，朝鲜人编纂的地方志中的地图就是依照中国方志地图的形制而绘制的。

(二) 《广輿图》中的“朝鲜图”

明罗洪先（1504—1564年）曾根据元朱思本的《輿地图》于1541年前后绘成《广輿图》，他在《广輿图序》中说：“按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西方，易以编筒。仰惟大明丽天声教，无外远軼，古今可以观德，作輿地总图一；内畿外邦，域民建守，小大相承，动无遗法，作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十六；王公设险，安不忘危，夷夏大防，严在疆圉，作九边图十一；山谷藏疾，时作弗靖，虺兕窜伏，功在刊涤，作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图五；壶口既治，宣房载歌，沉玉负薪，群策毕效，作黄河图三；水陆紫紆，漕卒岁疲，储峙孔艰，国用攸赖，作漕河图三；四海会同，溟渤运输，仿佛往踪，用备不虞，作海运图二；四夷来王，兵革不试，治之极也，作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图四，终焉。凡沿革附丽、统驭更互，难以旁缀者，各为副图六十八。山川城邑，名状交错，书不尽言，易以省文二十有

四。”^{〔51〕}

《广舆图》今存有多种版本，其中均有朝鲜图。罗洪先绘制《广舆图》不过是“今据画方，易以编简”。他并没有亲自去实测，编图的依据主要是朱思本《舆地图》，再加上其它一些图籍。由于朱思本的地图已不复见，所以罗洪先《广舆图》中的“朝鲜图”究竟是依据朱图绘制，还是依据另外的“朝鲜图”绘制的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这幅具有方格的“朝鲜图”应是依据朝鲜人绘制的“朝鲜地图”而绘制的。不然，仅据文字材料不太可能绘得如此准确。

（三）王泮“题识”朝鲜增补本《舆地图》

在法国国家东方部中收藏一幅“山阴王泮识”的中国古地图，该图长180厘米，宽190厘米，绢底彩绘。此图所绘范围东至朝鲜、日本，西达天山、大流沙，北抵黑龙江、蒙古高原，南括南海。“是图也具钺两都十三省，泊都省所隶府一百五十有二，州二百有四十，县一千一百有七，卫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八百五十有四，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诸司二百一十有八。都省而外，朝贡归王若朝鲜、安南等五十六国，速温河等五十八岛，奴儿干、乌思藏等都司所辖二百三十八区，靡不□列若星布云。”^{〔52〕}但是不知作者和成图年代。在图中还有一段注记文字：“《天下舆地图》一本，旧行于中国，经变之后不复见矣，近得印本《舆地图》八幅，山阴王泮识之。天朝视我东，不啻内服，雨露所沾，舟车所通，目不及睹，足不及履，则写之为图，一便览了者诚不可一日无也。今因是图，更考《大明官制》、《一统志》，则两京及十三省府、州、县、卫、所互有增减。□此略正约于一，附以我国地图，以见天朝一统之大，于今为盛也，至于日本、琉球、奴儿、忽温之属，并志其地，后之览者不可不知是图之所始。”^{〔53〕}

仔细分析后段文字，可知此段文字为朝鲜人所写：

（1）文中曰：“天朝视我东，不啻内服”。“天朝”为李朝对我国的称呼。明《神宗实录》卷三百零八曰：“（万历二十五三月甲辰）朝鲜国王李昫上疏求援，言：‘倭贼不撤，余众要遣陪臣，既非天朝原约，及陪臣随册使前去，又以官卑不纳，盖欲借此为辞，开衅动兵耳，况蒙天朝大恩，诰命诞颁，而驱迫册使克日渡海，又不遣一倭恭谢，悖慢之状，此亦可见。清正素懦弱，今复领兵狂逞，决不可以他计縻之。若天朝救援少迟，则全庆忠、黄被贼蹂躏，鸭绿透东遍为贼窟。’”^{〔54〕}朝鲜国王李昫疏中连用三次“天朝”之称，足证指中国明廷。

“视我东”即谓将我视为东土。明《太祖实录》卷四十曰：“（洪武二年八月）丙子，遣符宝郎俛斯赉诏及金印、诰文往高丽封王颙为国王，诏曰：‘……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司简生衅隙，使各安生。……’诰曰：‘咨尔高丽国王王颙，世守朝鲜，绍前王之令绪，恪尊华夏，为东土之名藩。……’”^{〔55〕}由此可见明廷（天朝）确将朝鲜（我）视为东土（东）。

（2）文中曰：“附以我国地图……至于日本、琉球、奴儿、忽温之属，并志其地，”图中有朝鲜、日本、琉球等地，但此文中只称有日本、琉球等，而无“朝鲜”，表明“我国”即指“朝鲜”。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此段注记为朝鲜人所作。而根据这段注记知道此图非王泮“识之”的原图，因为“王泮识之”原图为“印本《舆地图》八幅”，而此图则是经朝鲜人“更考《大明官制》、《一统志》”、“附以我国地图”、“至于日本、琉球，奴儿、忽温之属，并志其地”后绘制而成的，这也是一幅中朝合璧的地图。

（四）李朝申叔舟《海东诸国记》的传入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曰：“(万历二十七年春正月丙午)兵部赞画主事丁应泰疏论总督邢玠等赂倭卖国，尚书萧大亨与科道张辅之、姚文蔚等朋谋欺罔。又言朝鲜阴结日本，援《海东记》为争洲事为证，语多不根。上寝其奏不下。”⁶⁶丁应泰为朝鲜兵部赞画主事，他上疏给明廷控告“邢玠等赂倭卖国”，文中引用了《海东记》一书。此书是何人所写？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有所交代：“(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壬子)朝鲜王李昫奏辩丁应泰疏，大略谓：‘小邦服事之义，天下所知。正统癸亥迄嘉靖癸未、癸丑、丙辰等年，俱获入犯之倭，节次献俘，屡蒙奖赏，此皆小邦竭心殚力以效藩屏之职者也。惟小邦不幸与倭为邻，岁为边患，……至于《海东记》，乃正统年间因其来使遣内陪臣申叔舟往日本，通谕验察彼中情形，得其国风俗、世系、地图，遂因其本藁附，以小邦馆待事例，作为一册，以为异国奇闻。……伏愿圣明将臣所奏特下公庭查辩。’上命兵部会廷巨看议以闻。”⁶⁷朝鲜王李昫向清廷上奏辩论“丁应泰奏疏”，奏文中说“《海东记》乃正统年间内陪臣申叔舟往日本”“得其国风俗世系、地图”后撰写而成。《海东记》就是《海东诸国记》的简称，今存。它是一部地理著作，书中有海东诸国总图、日本本国图、日本国西海道九州图、日本国一歧岛图、日本国对马岛图、琉球国之图，并附熊川芥浦图、东莱富山浦图、蔚山盐浦图。

这本书是否在当时便传入中国还不能肯定，但据朝鲜王李昫对于丁应泰奏中引用此书内容而进行解释的态度，似有可能，李昫将此书一并送给了明廷。如果这种推断能成立的话，那么这本书便成了日本地图经过朝鲜人改绘而又传入中国的这种双重交流的实证。

(五)《郑开阳杂著》中的“朝鲜国图”

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⁶⁸卷五中的“朝鲜国图”，画有方格，图中标“每方百里”，说明它比较精确。图后是文字部分，为朝鲜考、世纪、都邑、山川、古迹、风俗、土产、国朝至朝鲜东界地里、本朝贡式。在“都邑”部分详细叙述了京畿道、江原道、黄海道、全罗道、庆尚道、忠清道、咸镜道、平安道等八道的府、州、县的具体数目和名称。在“山川”部分详细地叙述了大山和大江的位置。在“国朝至朝鲜东界地里”部分具体地记述了中朝边界两边及朝鲜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从这些现象可以推断：这些材料是来自朝鲜的，因而书中的“朝鲜国图”很可能是根据朝鲜人的地图绘制的。

(六)《皇明职方地图》中的“朝鲜图”

明陈组绶有《皇明职方地图》(1636年)，他在《皇明职方地图大序》说：“元人朱思本计里画方，山川悉矣，而郡县则非。罗念庵先生因其图，更以当代之省府州县，增以卫所，注以前代郡县之名，参以桂少保、李太宰、默二公之图叙，广以许论之《边图》，郑若曾之《海图》，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谓精意置制，略无异议。但以天下幅员之广，道里无数，则东西南北不辨。旧图于郡县惟记其名，不书其险；所以郡县可考，而山川之险阻莫测。京省郡县，全在责实于内，故凡述逃藪译，不可不备。旧图于边墙图其内，不绘其外；所以图以內易见，而图以外难知。九边之要，全在谨备之外，故外夷出没，不可不详。明图边镇不分，大宁、开平、兴和、东胜四边虽失，犹二祖之版图也，乌可遂弃而不问？旧图有黄河有漕河，皆今昔莫辨，而无农丈人之《禹贡河山图》，无《江山图》，无《弱水图》，无《黑水图》，以此高山不足以刊旅，大川不足以涤源。旧图漕河太略，无海防而有海运，无《太仆图》。旧图在万历以前，今历两世，朝代异则沿革异，故不揣复因七氏之图而加广之。爰作天下大一统图二，以辨全览；作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十五，以知官守；作新旧九边图，七镇图十有五，以严大防；作山川图四，以察地势；作河漕海运图二，海防图一，以别水道；作太仆统

辖图一，以知马政，而亦尾以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岛夷图终焉。”^{〔68〕}

根据此“序”，可知陈组绶是在罗洪先《广舆图》等7种图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皇明职方地图》。陈也绘有“朝鲜图”，它与罗的“朝鲜图”不太一样，可知是参考了其它有关朝鲜的图籍的，这些图籍虽未必由朝鲜人亲自所给，但有可能是流传于中土的朝鲜地理图籍。

另外，陈组绶始作“太仆统辖图一，以知马政”，而在朝鲜也有类似的《牧场地图》^{〔69〕}（1678年），它也是由类似于中国太仆寺的牧马机关司仆寺所绘制，因而这种地图是受中国的地图影响绘制而成的“太仆统辖图”。

四、西洋地图学的影响

（一）中文本耶稣会士的西洋地理图籍再传播

明代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绘制的地图和其他人撰写的地理图籍在中国刚刚面世，就传入了朝鲜。

李朝宣祖时代的儒臣许筠，作为使节派到燕京。这时，正值为传教到明朝的传教士耶稣会神父利玛窦觐见明神宗，并在北京开始传道不久。作为使节到北京的许筠参观了新建的天主堂，得到了地图和基督教十二端，因而他是第一个将西学传入朝鲜的人^{〔61〕}。当时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朝鲜的地理图籍有：

1. 《坤輿万国全图》与《三才图会》

李朝李晔光《芝峰类说》卷二“诸国部”曰：“万历癸卯（公元1603年），我任副提学时，赴京返回，使臣李光庭权禧将欧罗巴輿地图一件六幅送与本馆，盖为京师处所得。观其图甚精巧，西域犹为详尽，中国地方及朝鲜东八道、日本六十州，地理远近大小无一遗漏。所谓欧罗巴国位于西域，最为遥远，距中国八万里，自古不通中朝，至大明始再次入贡。地图乃该国使臣利玛窦所作，末端作序文记之。其文字典雅，与我国文学无异。最初的信书而且是同文犹为可贵。按其国人，利玛窦、李应诚（试）者，亦俱有《山海輿地全图》，王圻《三才图会》等颇用其说。欧罗巴地界南至地中海，北至冰海，东至大乃河，西至大西洋，地中海乃是天地之中，故有此名。”^{〔62〕}

根据研究，“欧罗巴輿地图一件六幅”就是1602年利玛窦所刊《坤輿万国全图》^{〔63〕}。

朝鲜《增补文献备考》卷之二卷二百四十二“艺文考”一曰：“仁祖九年（1631年），郑斗源回（自）京师（北京），献西洋人陆若汉所赠《治历缘起》一册、《天文略》一册，利玛窦《天文书》一册、《远镜书》一册、《千里镜说》一册、《职方外记（纪）》一册、《西洋国风俗记》一册、西洋国贡献《神威大镜疏》一册、《天文图南北极》两幅、《天文广数》两幅、《万里全图》五幅、《红衣炮题本》一。”^{〔64〕}这里《万里全图》当为《万国全图》之误，亦即《坤輿万国全图》的简称。由郑斗源带回去的地理图籍有《职方外纪》、《西洋国风俗》和《坤輿万国全图》等。

2. 《两仪玄览图》

由李应试帮助制成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是八张一幅的《两仪玄览图》。日本中村拓和鲇泽信太郎曾见到由朝鲜江原道蔚珍郡箕城面沙铜里人黄炳仁所藏《两仪玄览图》^{〔65〕}。据黄氏说（1930年左右），大约三百年前（应该是四百年前），他的先祖黄汝一被派遣出使明朝时，带回了这幅《两仪玄览图》。

黄汝一，字会元，号海月轩，平海人，应经之子，少时即以能文著名。宣祖丙子（1576年）

中司马，乙酉(1585年)登文科，扬历清显，万历壬辰(1592年)任元帅权标的从事官，升为二等功臣。戊戌(1598年)持弃诬书状赴燕，名震中夏。有《朝天录》等著作，官至参判，享于明溪书院。子中允，号东溟，登文科，官至承旨，任特使赴燕，也著有《朝天录》^[66]。

根据记载，黄汝一一行前往明廷是万历戊戌二十六年(1598年)，回国是次年(1599年)，但《两仪玄览图》出版于万历癸卯(1603年)，因而黄汝一不可能带回此图。由于汝一之子中允也“任特使赴燕”，故极有可能是他带回《两仪玄览图》。只因汝一名声大，所以这一功劳就被记在他的名下了。

3. 《职方外纪》中的地图

前述郑斗源回京师(1631年)，便带回有艾儒略《职方外纪》。

另星湖李瀲(1682—1763年)是英祖时期以博学多能震撼一时的大学者。他对西学着迷不比寻常，他曾贪婪地阅读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1623年)、汤若望的《主判群征》、庞迪我的《七克》(1614年)等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据说其中的《天主实义》是他最爱读的书。此外，他专心阅读熊三拔的《泰西水法》(1612年)、阳玛诺的《天问略》(1623年)，艾儒略的《职方外记》(1623年)等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书籍。^[67]而《职方外纪》中是地图的。

4. 地球仪

仁祖时期，清太宗率十万大军入朝鲜，仁祖投降，作为人质清带走了昭显世子和风林大君。两位王子在北京一面过着流亡生活，一面与当时的北京主教耶稣会神父汤若望结交，学习天文、数学等西方科学知识。世子回国时，向汤若望恳请带回西洋神父。由于洋人神父缺少，未能如愿以偿。他带回了天文、数学和基督教的书籍及天主像、地球仪。但世子回国仅七十天就因疫病猝死。由于世子猝死，宫中传播各种谣言，于是就烧掉了世子一行带来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和物品^[68]。地球仪是否被毁不得而知。

(二) 朝鲜年贡臣携带中国各省地图

朝鲜《通文馆志》卷之九“纪年”曰：“肃宗大王三年丁巳(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礼部咨，节该本部题年贡陪臣吴廷纬、伙内慎行建带各省地图，为凤城章京搜捉。特遣大臣查审定罪。奏旨：‘免遣大臣，着该国王查奏。’慎行建供称：天下地图，自古流传，或为屏簇帖册。故欲知走路远近，带行其摹写纸样可验为我国物等因具奏，迫付谢使。礼部回咨……慎行建虽称出伊国人之手，如将朝鲜纸带来，盗书妆样，亦何不可。将行建边界充军，陪臣等革职。在伊国屏障帖州，该国俱行查毁。奉旨：‘从宽免罚前后陪臣，事在赦前，俱免。余依议。’”^[69]朝鲜《增补文献备考》(补)京聘考(五)也记载此事：“(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礼部咨，肃宗三年，本部题，使臣吴挺纬伙内慎行建带各省地图，为凤城章京搜捉。特遣大臣着该国王查奏。慎行建供称，天下地图，自古流传，或为屏簇帖册，故欲知走路远近，带行其摹写纸样，可验为我国物等因具奏。顺付谢使。”^[70]

上述史料表明：(1)在李朝普遍流传着中国的“各省地图”，有的还以屏簇(即屏风)和帖册(书本式)的形式存在，这些地图当然是来源于中国。(2)朝鲜使臣来中国一般带有中国各省地图，以便旅行或别事所用。(3)清朝政府对地图的外流管制很严，不让轻易外传。

(三) 朝鲜人引用《大明一统志》

朝鲜古籍《北路纪略》“中国称长白山”条曰：“《大明一统志》，长白山在故会宁府南六十里，横亘千里，高二百里，上有泽，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

阿也苦江。”同书“州郡沿革”条曰：“《大明一统志》云：开元城，在三万卫西门外，……”^{〔71〕}李朝人引用《大明一统志》写书，当然该书也就流传入了朝鲜。另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二曰：“〔康熙三十年七月己丑（1691年7月30日）〕礼部题：‘朝鲜国进贡使臣违禁私买《一统志》书。查《一统志》载天下山川舆地钱粮数目，所关甚重。应将违禁私买《一统志》书之内通官张灿革职，发伊国边界充军，正使李沉、副使徐文重等，失于觉察，并应革职。朝鲜国王李焯姑免议’。得旨：‘李沉、徐文重从宽免革职。余如议。’”^{〔72〕}这里所说的《一统志》究竟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呢？

《大清一统志》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开始纂修，《圣祖实录》卷一二六曰：“〔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庚寅（1686年6月27日）〕谕《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等：‘……顾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国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巨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几之余，朕将亲览’”^{〔73〕}但此志至乾隆八年（1743年）才成书。朝鲜使臣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私买的《一统志》当为《大明一统志》。

《大明一统志》完成于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共九十卷，该书中也有不少地图，如“京师畿内地理之图”、“大明一统之图”、“南京畿内地理之图”以及各省地图。此书传入朝鲜也就将明代的地图带入了朝鲜。

（四）朝鲜弘文馆提学李颐命绘《辽蓟关防地图》

《辽蓟关防地图》为朝鲜弘文馆提学李颐命（1658—1722年）绘于肃宗三十二年（1706年），图10幅，彩色，画在屏风上，第一幅大小为134.5×60.5厘米，第2—9幅大小为134.9×6.4厘米，今存^{〔74〕}。李颐命在注记中说：“右《辽蓟关防图》出于臣使燕时所购得，皇朝职方郎仙克谨所著《筹胜必览》之书臣既承移写以进之，命又耻清所编《盛京志》所载‘乌喇地方图’及我国前日《航海贡路图》与《西北边界（图）》合成一图。”^{〔75〕}由此可知：（1）此图的原图系李颐命使清时所购得；（2）同时所得还有清人仙克谨的《筹胜必览》；（3）李颐命还得有《盛京志》中的“乌喇地方图”；（4）李氏在编制屏风《辽蓟关防地图》时是以清人《辽蓟关防图》为底本，并参考《盛京志》中的“乌喇地方图”和朝鲜的《航海贡路图》、《西北边界（图）》绘制而成的。

（五）中国乌喇总管穆克登等绘制“中朝界域图”

朝鲜《通志馆志》卷之七“人物”中“金指南”条曰：“金指南，字季明，岑城人。……〔康熙〕壬申（1692年），随闵尚书就道赴燕。……壬辰（1712年），帝令乌喇总管穆克登行审鸭绿江以上至土〔图〕门江入海处，查明边界。……公谓穆曰，夫两江作界自古已定，而两江之源出自白头山顶潭水，潭之北为上国之界，其南即吾地。反复晓告，穆果大悟，遂导至山巅，立碑潭畔以为界。又画山川疆域作为二本，一进皇帝，一置本国以为左契。”^{〔76〕}

但是是谁“画山川疆域二本”呢？同书“纪年”肃宗大王三十八年壬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条记得稍微清楚一些：“礼部咨，节该奉旨：‘穆克登等项自凤城至长白山查我边境，因路远水大而止，俟春冰泮自义州江源溯流而上，若舟不能前进，即由陆路往土门江，倘中途有阻，令朝鲜国稍为照常’云云。……克登带画师随处绘画山川，缮写界域图二本，一进皇帝，一进本国。”^{〔77〕}由此可知，绘图人为穆克登所带“画师”。

中国史籍中亦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且表明此事还与验证修改康熙《皇舆全览图》有关。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五康熙五十年五月癸巳（1711年6月20日）载：“谕大学士等曰：‘……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后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入于海。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的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玩枝事，又派出打牲乌喇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密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方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还奏。’想伊等已由彼起程前往矣。此番地方情形，庶得明白。”^{〔78〕}

同书八月辛酉（1711年9月16日）又曰：“上谕大学士等曰：‘前差打牲乌喇穆克敦等查看凤凰城至长白山边界，伊等业将所查出地方绘图呈览。因路远水大，故未能至所指之地。著于来春冰解之时自义州乘溯流而上，至不可行之处，令其由陆路向土门江查去。但道里辽远，万一途中有阻，令朝鲜人供应。将此情由，令该部晓谕来朝正之朝鲜国官员，书旨给带付伊王。’”^{〔79〕}

“五月癸巳上谕”前段讲的就是康熙领导的《皇舆全览图》中东北部分测绘的情况，具体参加测量的传教士“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只因“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因此“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后“又派出打牲乌喇总管穆克登同往”。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为绘地图而去，与李朝史籍中所载“克登带画师随处绘画山川”相吻合。图绘好以后，一份进中国“皇帝”，一份交给李朝政府。

（六）清使何国柱在汉城测量

朝鲜金正浩《大东地志》卷二十八“程里考”曰：“肃宗三十九年（1713年），清使何国柱率五百司历来到，实测北极高度于汉城府鍾路街，得三十七度三十九分一十五秒，准北京顺天府中线，汉阳编（偏）东十度三十分。正宗十五年，命监臣依汉阳北极高度，准舆地图经纬线，量定八道观察使营高及偏东西度。”^{〔80〕}

文中所讲“何国柱”，确有其人。《清史稿·时宪志》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月，驾幸避暑山庄。征梅文鼎之子梅毂成诣行在所。先是命苏州府教授陈厚耀，钦天监五官正何君锡之子何国柱、国琮（宗），官学生明安图，原任钦天监副成德，皆扈从侍直。上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子。”^{〔81〕}由此可知何国柱是著名天算家何国琮（宗）之兄，曾跟随圣祖康熙学习历算。何国柱在雍正年间为兵部郎中兼管钦天监左监副事加二级，参与《御制律历渊源》的校算^{〔82〕}。

何国柱在汉城测量经纬度值是为了绘制《皇舆全览图》中“朝鲜地图”部分的。所测数值既记录于朝鲜舆地著作中，当也为朝鲜绘图所参考使用。

（七）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朝鲜地图”

J. B. 杜赫德在《测绘中国地图纪事》中说：“（《皇舆全览图》中）朝鲜是取自该国王宫内所藏地图在两国边境内上由传教士校正，如前所述，当时这些传教士正受命在那里测绘鞑靼地图。”^{〔83〕}

康熙《皇舆全览图》始绘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三曰：“康

熙五十八年二月乙卯(1719年4月1日)谕内阁学士蒋廷锡:‘《皇輿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寻九卿奏称:‘……我皇上以生知之圣,殚格致之功,分命使臣测量极度极高,差一度为地距二百里,昼夜之长短,节气之先后,日食之分秒时刻,都邑之远近方位,皆于是乎定。天道地道,兼而有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皇上精求博考,积三十年之心力,核亿万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画形胜于几席之上。臣等荷蒙皇上教思不倦,得以瞻仰披寻。昔曾经过之区,宛然阡陌,素所未历之境,不啻乡闾,而于《禹贡》所书,古今图志所传,平日有迷莫指,有感莫法者,一旦豁然贯通,涣然冰释,此诚开辟方员之至宝,混一区夏之巨观,昭揭日月,而万世不刊者也。’^[84]

由此可知《皇輿全览图》绘制的过程及其大体内容。后来的《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它甚至一直影响至民国申报馆《中华民国新地图集》的绘制^[85]。就是这一地图中的朝鲜地图“是取自该国宫内所藏地图”经校正绘制而成的。“该国宫”应指朝鲜国宫,因为何国柱等为绘图曾来汉城。“所藏地图”即朝鲜人绘制的地图,而我们在称颂康熙绘制《皇輿全览图》的伟绩时,不能忘记朝鲜人所作的贡献。

(八)李澍等采购《古今图书集成》

朝鲜《增补文献备考》卷之二百四十二“艺文考”一曰:“正祖二年(1778年),使臣李澍、徐浩修等,回自燕京,购来《图书集成》一部五千余本。”^[86]据清《世宗实录》卷三:“〔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1723年1月18日)〕谕内阁九卿等:‘……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海,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本,百工制造,海西秘书,靡不备具,洵典籍之大观。’”^[87]

由此可知《古今书集成》一书的编纂始于康熙末年,由陈梦雷主持。据记载后又由蒋廷锡等重加编校增删,至雍正四年(1726年)告成。全书分为六个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〇九部,其中第二编为方輿编,它又分坤輿、职方、山川和边裔四典。在坤輿典中收入不少地图,其中刚绘完的著名《皇輿全览图》便被分幅收入该书中。在博物编艺术典中收录有大量的堪輿地图。另外在历象编历法典中有测量部,在经济编考工典中有规矩准绳部,这些都是中国测量知识的结集^[88]。这部书传入朝鲜可能是中国地图和测量知识输入朝鲜最集中的一次。

参 考 文 献 与 注 释

- [1] 李洪淳:《孔子,儒学思想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的比较》,《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20页。
- [2] 《诗经·周颂》,《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 [3] 同[2]。
- [4] 《尚书·洛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 [5] 《春秋左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 [6] 同[1]。
- [7] 同[1]。
- [8]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转引自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页。
- [9] 〔魏晋〕刘徽:《九章算术注》,《算经十书》(钱宝琮校注),中华书局,1963年10月,第92页。
- [10] 同[9]。
- [11] 〔唐〕张九龄:《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

- [12] [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
- [13] [汉]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 [14]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 [15] [清] 刘喜海校录：《海东金石苑》，转引孙进已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3卷），辽沈书社，1990年8月，第634页。
- [16] [唐]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 [17] [李朝] 卢思慎等：《三国史节要》，韩国汉城景仁文化社。
- [18] [清] 王先谦：《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7月。
- [19] [汉]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 [20] [21] [22] [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长白丛书（五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8月。
- [23] [宋] 徐兢撰，朴庆辉标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标注前言”，长白丛书（五集）。
- [24] [宋] 费衮：《梁溪漫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 [25]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 [26] [宋]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正》，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 [27] [宋] 张方平：《乐全集》，四库全书本。
- [28] [清]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
- [29] 韩国图书馆学研究会：《韩国古地图》，1977年。
- [30] [香港] 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3月。
- [31] 同[30]。
- [32] [33] [明] 叶盛：《水东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 [34] [日] 福井康顺等著，朱越利等译：《道教》（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第94页。
- [35] 同[20]。
- [36] [37] 同[34]，第95页。
- [38]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
- [39] 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100页。
- [40] 同[2]。
- [41] 何晓昕：《风水探源》，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
- [42] [晋] 郭璞：《葬书》，《古代风水术注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 [43] 钱士青：《钱氏所藏堪舆书提要》，商务印书馆，1942年8月。
- [44] [明] 徐善继：《地理人子须知》，万历十一年（1583年）重刊本。
- [45] [高丽] 释一然：《三国遗事》，韩国汉城景仁文化社，1977年。
- [46] 同[24]。
- [47] [宋] 祝安礼：《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
- [48] 曹婉如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一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8月。
- [49] 见[24]。
- [50] 同[48]。
- [51] [明] 罗洪先：《广舆图》，嘉靖初刻本。
- [52] [53] 任金城等：《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初探》，载曹婉如等：《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
- [53] 明《神宗实录》。
- [55] 明《太祖实录》。
- [56] [57] 同[54]。
- [58] [明] 陈组绉：《皇明职方地图》，崇祯刊本。
- [59] 同[29]。
- [60] [明] 郑开阳杂著：《四库全书本》。
- [61] [韩国] 金得槐著，柳雪峰译：《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第232—233页。

- [62] [李朝] 李晔光:《芝峰类说》,转引自[65]。
- [63] [日] 站泽信太郎著,康小青译:《关于利玛窦的〈两仪玄览图〉》,《科学史译丛》,1983年第3辑。
- [64] [李朝] 弘文馆编《增补文献备考》(250卷)。
- [65] [66] 同[63]。
- [67] 同[61],第236页。
- [68] 同[61],第234页。
- [69] [李朝] 金指南等撰:《通文馆志》(十二卷),朝鲜史编修会史料丛刊第二十一号,韩国汉城正文社,1982年。
- [70] 同[64]。
- [71] [李朝] 佚名撰:《北路纪略》(四卷),转引自王崇实等选编:《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
- [72] 清《圣祖实录》。
- [73] 同[72]。
- [74] [75] 同[29]。
- [76] [77] 同[69]。
- [78] [79] 同[72]。
- [80] [李朝] 金正诰:《犬东地志》。
- [81] 赵尔巽主修:《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
- [82] 《御制律历渊源》。
- [83] J. B. 杜赫德著,葛剑雄译:《测绘中国纪事》,《历史地理》第二辑。
- [84] 同[72]。
- [85] 汪前进:《〈皇舆全览图〉测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10月。
- [86] 同[64]。
- [87] 同[72]。
- [88] [清]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SINO-KOREAN EXCHANGE OF CARTOGRAPHY IN HISTORY

Wang Qianjin

Abstract

China's knowledge of cartography spread into Korea before the first century, and Chinese maps were transitted to Korea probabl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arliest Chinese surveying knowledge in the *Jiu Zhang Suan Shu* (Nine Chapters on the Mathematical Ar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ical theory "Six Rules in Map-Making" in *Biography of Pei Xiu of Jin Shu*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was introduced into Korea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Sino-Korean cartography, surveying knowledge, exchange

责任编辑:屈宝坤